

中国古代悼亡诗的写作传统

沈 童

(南开大学 文学院, 天津 30071)

摘 要: 悼亡诗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中特指悼念已故妻妾的诗作。悼亡诗随时代而发展, 逐渐形成共同的写作传统。悼亡诗的写作有两种情况: 情真意切的悲悼写作、无病呻吟的迎合礼制写作。写作时间也大体相同, 写于妻子去世一年之内和周年祭时, 此后数量锐减, 只有特定的时间、地点、事物才会偶然引发回忆而写作。突出表现伤痛是两种类型悼亡诗的共同特点, 写作时间也因此而集中在丧妻之痛最强烈的时刻。突出表现伤痛的原因有四点: 死亡意味着逝者的永久性消失, 它对人伦关系的破坏, 由此引发的死亡恐惧和生命忧虑以及丧葬文化的推动作用。

关键词: 悼亡诗; 写作传统; 特点

中图分类号: I207.2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5-2910(2020)03-0067-05

何谓悼亡? 顾名思义, 应该是悼念死去的人, 这是广义的悼亡概念。在中国文学史上, 悼亡被赋予了特定的含义, 即悼念已故的妻妾。《诗经》中的《邶风·绿衣》和《唐风·葛生》被认为是最早的悼亡诗, 潘岳的《悼亡诗》3首初次冠其以“悼亡”之名, 确立了悼亡诗的体制, 狭义的悼亡概念也从此形成, 后代的元稹、苏轼、贺铸、纳兰性德都堪称悼亡大家。

一、悼亡诗的两类型

悼亡诗可分为两种类型: 情真意切的悲痛怀念之作、无病呻吟的迎合礼制之作。

在中国古代文学发展过程中, 《诗经》之后的正统文学受儒家思想影响, 很少公开表达男女之情。宋词开辟了表达情爱的新天地, 但其中的女性多为歌妓, 而非妻子。中国古代文人写给妻子的诗非常之少, 有限的几首寄内诗中也没有表达夫妻之爱的内容。可以说“妻子之死是(中国)男人可以公开合法地表达自己对配偶之爱的唯一机会”^[1], 这对爱的漫长缄默, 使得妻子永诀留下的痛苦和追怀, 化作无尽的歉疚和憾恨, 发为凄楚哀婉的悼亡诗。诗人

对妻子的所有爱慕、眷恋和尊敬, 似乎都在此刻全部倾泻出来。

死亡意味着永远的失去, 痛苦是悼亡诗中最突出的情感。在男主外、女主内的社会背景下, 女主人撒手人寰很大程度上意味着一个家庭的崩溃: 有屋无家、儿女失恃。许多悼亡诗词中写到妻子去世之后, 家庭生活的清冷无味, 幼小子女的可怜情状。有的作品中对比了妻子在世时和妻子亡故之后的家, 如韦应物: “昔出喜还家, 今还独伤意。”(《出还》) “昨者仕公府, 属城常载驰。出门无所忧, 返室亦熙熙。今者掩筠扉, 但闻童稚悲。”(《往富平怀》) 元稹: “朝从空屋里, 骑马入空台。尽日推闲事, 还归空屋来。”(《空屋题》) 失去了妻子的家, 只是一间空屋而已, 过去回家曾经意味着和亲人团聚, 意味着天伦之乐, 现在却意味着深深的伤感和孤独, 平淡之语实寓彻骨之悲。而通过写失母的稚子来表达悼亡之情的诗作, 尤其让人心酸。韦应物写妻死后无知稚子的表现, 极其真切感人, “幼女复何知, 时来庭下戏。”(《出还》) “童稚知所失, 啼号捉我裳。”(《送终》) 杨慎在妻去世之后孩子的生日时写到: “稚子今朝是两周, 新衣戏舞拜前头。伤心

孺慕生生切，母在重泉听得不？”（《八月十三日夜梦亡室安人惊泣而寤因思去年丁》）十分凄惨，幽冥永隔，亡妻再也听不到稚子的呼唤。马世奇：“寻常第一伤心事，稚女床前唤阿爷。”（《春日感怀》之二）真是催人泪下之语，丈夫失去了妻子，孩子失去了母亲，家庭失去了重心，幼女那一声稚嫩的呼唤，把摧心裂肝的苦痛，全部激发出来。失去妻子的痛苦是如此强烈，甚至会让诗人对人生失去兴趣，转而羡慕死者。纳兰性德：“此恨何时已。滴空阶、寒更雨歇，葬花天气。三载悠悠魂梦杳，是梦久应醒矣。料也觉、人间无味。不及夜台尘土隔，冷清清、一片埋愁地。钗钿约，竟抛弃。”（《金缕曲·亡妇忌日有感》）词人说，他的爱妻其实并未死去，她只是在做梦，既然是在做梦，那么总有一天会醒来，“是梦久应醒矣”，然而为什么“三载悠悠”不见人归呢？纳兰性德给出了解释：“料也觉，人间无味。”人间还不如冷清的阴间，那里起码不会再感受到痛苦。“无味”两字中包含着无尽的凄楚辛酸，道出了“人间”乃苦海这一对现实人生的痛苦认识。蒲松龄也有同样的感受：“迩来倍觉无生趣，死者方为快活人。”（《悼内（其六）》）失去亲人的痛苦让人难以承受，这时生者反而会羡慕死者，死者再也不会感觉到痛苦，而活着的人还要苦苦煎熬，如果自己也死去，那么这种痛苦就可以结束了。

此外，不少悼亡作品还表达了愧疚追悔之情。有的是因为生活艰辛，让妻子终日操劳；有的是因为聚少离多，丈夫未能尽责。元稹的愧疚缘于妻子生前艰辛操劳，没有让她过上安稳的生活，他的《三遣悲怀》回忆妻子的艰辛付出，抒发以内疚为主的悼亡之情。“谢公最小偏怜女，自嫁黔娄百事乖。顾我无衣搜荻箧，泥他沽酒拔金钗。野蔬充膳甘长藿，落叶添薪仰古槐。今日俸钱过十万，与君营奠复营斋。”^[2]自小为掌上明珠的妻子，嫁于元稹后备尝生活艰辛，却体贴而毫无怨言，她从没享受过“今日”的“俸钱过十万”，诗人也只有“惟将终夜长开眼，报答平生未展眉”。于谦则是因夫妻聚少离多，自己未能尽责而追悔，“去岁之秋，疾势颇张，以书告我，我以为常。……子之疾也，吾不得为之眵视；子之

逝也，吾不能与之永诀。”（《祭亡妻淑人董氏》）妻子生病和去世，自己都没能陪伴左右，其中自责悔愧之情，溢于言表。于谦在其妻死后，既不再娶，也不纳妾，他把自己对董氏生前未能尽责的歉疚，在其死后进行了补偿。“中国社会表面上虽以家庭为基础，骨子里却侧重兼善主义。文人往往费大半生的光阴于仕宦因旅，‘老妻寄异县’是常事。”^[3]妻子在世时，潜心于仕途的诗人对这种状况似乎还没有太多的歉疚，一旦妻子离世，他们心底的歉意才突显出来，往往后悔曾经因为仕途而忽略了妻子。如艾性夫的“最惭误看刘蕡策，辜汝相依四十年”（《悼亡二首（其一）》）与戴复古的“求名求利两茫茫，千里归来赋悼亡”（《题亡室真像》）。对于妻子而言，丈夫求取功名，建功立业，是值得支持的大事，所谓夫贵妻荣就是最终收获。但在丈夫奋斗过程中，家庭、尤其是妻子所遭受的艰辛是难以言状的。很多情况是，丈夫终于出人头地，而当初陪他奋斗共甘苦的妻子，却无法享福与之同富贵。于是在悼亡之中，浸染了许多自责与愧疚。

在潘岳之后，正妻亡故后丈夫赋诗悼亡逐渐成为约定俗成的常制。有的人即便对妻子感情不深，为符合礼制也要写几首无病呻吟的悼亡之作。比如顾炎武为王氏所做的《悼亡》五首：

独坐寒窗望藁砧，宜言偕老记初心。谁知游子天涯别，一任闺芜日夜深。

北府曾缝战士衣，酒浆宾从各无违。虚堂一夕琴先断，华表千年鹤未归。

廿年作客向边陲，坐叹兰枯柳亦衰。传说故园荆棘长，此生能得首丘时。

贞姑马鬣在江村，送汝黄泉六岁孙。地下相烦告公姥，遗民犹有一人存。

摩天黄鹤自常饥，但惜流光不可追。他日乐羊来旧里，何人更与断机丝。^[4]

在王氏去世前的二十年里，他们夫妻并不在一起。王氏一直在昆山老家，顾炎武常年在各地从事抗清事业，晚年基本上都是在北方度过的。他说的“一任闺芜日夜深”“坐叹兰枯柳亦衰”，都是客观事实。顾炎武和王氏曾有一子，三岁而亡。或许由

于求子心切，顾炎武曾多次纳妾。顾炎武在《规友人纳妾书》中写道：“炎武年五十九，未有继嗣，在太原遇傅青主，挽之诊脉，云尚可得子，劝令置妾，遂于静乐买之。不一二年，而众疾交侵。”^{[5] (P424)}在夫妻分离期间，他并不孤单，身边总是有姬妾相伴，甚至还弄出一身毛病。但是在家乡的王氏，大概一直过着孤寂的生活。当然，不能用现代人的婚恋观念来要求顾炎武。不过，这五首极力表现丧妻之痛的悼亡诗，字里行间仍然透露出顾炎武对王氏情感的淡薄。王氏值得他怀念的是什么呢？是她曾参与抗清斗争，“北府曾缝战士衣，酒浆宾从各无违”，为战士缝制衣裳，供应酒水。分别20年，顾炎武还能记得王氏什么好处呢？在诗中是看不到的。顾炎武和王氏50年婚姻，即使把后20年除去，尚有30年的共同生活，他所能想到的夫妻之情，仅止于此，这实在是王氏的悲哀。王氏生前数十年不能得到顾炎武的眷顾，死的时候，更加凄惨。由于没有子嗣，丈夫又不在身边，她只能由过继的子孙送终。即使这样，顾炎武还有任务给她：“地下相烦告公姥，遗民犹有一人存。”要她到阴间告诉公婆，他们的儿子始终没有归附清朝，至今还是大明的遗民。在悼亡时还不忘借机表达政治立场，可见王氏的死，没有带给他多深的悲痛。

二、悼亡诗的写作时间

悼亡诗大部分写于妻子死后一年之内和周年祭之时，此后数量锐减，在特定的时间、地点、事物偶然引发回忆时写作。

妻子新丧，往往是丈夫最痛苦的时刻，创作于妻子亡故之初的悼亡诗文数量最多，大多锥心泣血，极为惨烈。潘岳在其妻杨氏故去后写作《哀永逝文》，沉浸在丧妻的巨大悲痛中：“怅怅兮迟迟，遵吉路兮凶归。思其人兮已灭，览馀迹兮未夷。昔同途兮今异世，忆旧欢兮增新悲。谓原隰兮无畔，谓川流兮无岸。望山兮寥廓，临水兮浩汗。视天日兮苍茫，面邑里兮萧散。”（《哀永逝文》）妻子去世后，潘岳处于一种恍惚状态，山河变色，天地同悲。赵翼曾作诗回忆妻子生前的一些细节，尤其惨痛，摧人心

肝：“塞垣于役苦分离，奔赴仍怜片刻迟。生不并头频远别，死留一面作长辞。亟呼不应君真逝，欲语无穷我未知。最是弥留情更惨，一声声问客归期。”

（《悼亡（其二）》）扈从在外的赵翼听到妻子病重的消息，星夜驱驰往家赶，然而终究是迟了片刻：当他赶到妻子面前时，她刚刚停止呼吸。在妻子生前，夫妻不得长相聚首，如今残酷的命运竟让他们连死别也未曾实现。当赵翼发疯般地呼唤妻子的名字时，她却已逝去了。最令赵翼痛彻心扉的是，弥留之际，妻子一次又一次、一声又一声地问着丈夫何时能回来，她还有好多话要对他说，赵翼却再也无法听到。在这段时间，诗人常常回忆妻子的一生、恩爱的夫妻生活、丧礼前后的细节，描写对亡妻入梦、重得一见的渴望，表达自己的剧痛深悲。创作于这一时段的作品，在整个悼亡诗词中占很大比例。

周年祭又是悼亡诗创作一个集中的时间点。古制夫为妻服丧，应齐缞杖周，即妻丧后，夫应为妻守制一年，结束后方继续履行公职。西晋孙楚的《除妇服诗》首开妻子去世周年写诗悼亡的先例，经过潘岳《悼亡诗》三首的继承与发展，逐渐形成在妻子周年祭时赋诗悼亡的规范。后世悼亡之人，几乎必有作品作于周年祭时，其中自然有真情流露，但遵循规范的因素也不容忽视。

周年祭后，悼亡诗词的创作数量锐减，或者再无作品，或者因某些事物的触发而零星创作几首，这些事物多为妻子的遗物、与亡妻有关的特殊的时间、地点。作者的伤痛本来有所缓和，与妻子相关的事物又勾起了他们的悲痛，于是再次赋诗悼亡。物在人亡，与妻子联系越紧密的事物，越会触发诗人的悲痛。亡妻的遗物，最能勾起作者的悲痛。如蒲松龄的“但陈簪珥情难已，时检仓箱涕欲流”（《悼内六首（其五）》）。因为亡妻的遗物太让人悲伤，丈夫往往持“不忍看”的态度。如金代傅若金：“花阴昼坐闲金剪，竹里春游冷翠裙。留得旧时残锦在，伤心不忍读回文。”（《忆内》）当年昼坐于花阴，春游于竹里，而今金剪自闲，翠裙已冷，残锦尚在，忍读回文？亡后一事一物，无不伤心。又如“衣裳已施行看尽，针线犹存未忍开。”（元稹《遣悲怀三

首（其二）》“生平从未开君篋，此日开来不忍看。”（蒲松龄《悼内六首（其四）》）妻子的忌日、生日、七夕等节庆日，清明、寒食等扫墓的日子也会勾起悼亡者的丧妻之痛，创作悼亡诗词。如纳兰性德的《金缕曲·亡妇忌日有感》作于妻亡故三年的忌日，王十朋的《令人生日哭以小诗》作于妻子的生日，李商隐以七夕为题材的诗中有四首作于妻亡之后，悼亡意味明显。李濂《悼亡杂诗（其八）》“细雨逢寒食，携儿墓上啼”写于寒食上坟后。亡妻的旧居、墓地、夫妻曾经同游的地方也会勾起怀想与悼念。如韦应物：“洛京十载别，东林访旧扉。山河不可望，存殁意多违。时迁迹尚在，同去独来归。还见窗中鸽，日暮绕庭飞。”（《同德精舍旧居伤怀》）是旧时居所；蒲松龄：“百叩不一应，泪下如泉流。汝坟即我坟，胡为先着鞭？”（《过墓作》）是埋骨之地；贺铸：“重过阊门万事非，同来何事不同归？”（《鹧鸪天·半死桐》）是同游之处。

总体来看，悼亡诗大多写作于妻子亡故之初或周年祭时，有真情流露，也有迎合礼制之作，之后的作品较少。悼亡诗以情动人，因为深刻的哀伤体验而具有一种别样的哀伤之美，动人心魄。突出表现伤痛是悼亡诗的共同特点，写作时间也因此而集中在妻子亡故一年之内。

三、悼亡诗突出伤痛的原因

突出表现伤痛是中国历代悼亡诗的共同特点，这看似理所当然，其实哀悼者在哀悼过程中所经历的情感并不只有伤痛，还包括伤痛的平复。心理学家伊丽莎白·库伯勒·罗斯将哀悼者的心理分为否认、愤怒、讨价还价、消沉、接受五个阶段^{[5] (P136)}。其中接受阶段就是伤痛的平复。中国古代悼亡诗为什么对伤痛的平复鲜有涉及，形成了强化死亡、丧悼所引发的情绪波动，极写哀情，美化逝者的传统呢？

悼亡诗表现的是因死亡所引起的情绪波动，死亡对个人的意义是多维的，包括个体内部（对“自我性”的影响）、人际要素（对亲人的影响）、哲学要素（死亡与死亡恐惧）^[6]。由此分析，中国悼亡诗

突出表现伤痛的原因有三：死者生命消逝的不可复返、无可挽回性，突出了死者存在的价值和悼祭者对死者的情感；宗法制社会血缘关系派生的浓郁的伦理精神，使得中国悼祭文学强调个体死亡给家庭成员带来的情感创痛和某一人伦关系空白；死亡引发对自我价值、生命意义的思考，悼祭者由伤悼他人联想到人类归宿，进而归结到感伤自我。除此之外，丧葬文化的建构、整合功能也不容小觑，丧悼价值观支配下，强化伤痛已经成为文化无意识下的下意识反应甚至角色表演。

死亡的不可复返性，对悼祭者意味着永久性的丧失，逝者的价值、生者对逝者的爱，往往因死亡而更加突出。罗洛·梅曾说：“爱总是提醒我们不要忘记自己终有一死，当一位朋友或一个家庭成员死后，我们总是深深地感到生命的短暂和不可挽回。……有些人（也许大多数人）直到通过某人的死，体验到友谊、奉献和忠诚的可贵后，才懂得什么是深挚的爱……不免一死的意识，不仅丰富了爱，而且建构了爱。”^[7]丈夫对妻子的爱，在她死去之际会顿时勃发出来，由此分外感到妻子的价值和这价值的不可挽回。所谓失去才知珍贵，“失去的天堂之所以是真正的天堂，不是因为回想起过去的欢乐似乎比眼下的欢乐更美妙，而是因为只有记忆才能提供一种无需忧虑其消逝的欢乐，因而也只有记忆才能使欢乐具有一种本来不可能具有的持久性。”^[8]悼亡情感，借助死亡对人生的否定性，将有关妻子的一切回忆给净化、美化了。如纳兰性德：“谁念西风独自凉，萧萧黄叶闭疏窗，沉思往事立残阳。被酒莫惊春睡重，赌书消得泼茶香，当时只道是寻常。”（《浣溪沙》）当死亡夺走了往日的欢乐，那些回忆中的生活琐事，连同其所携的人生价值才显露无疑，让人倍感珍重。“我们越是感到死亡是一种否定，人们就越是深深地哀悼死人不再能享受生命之光，我们就越是看到死人的功绩和德行发出更耀眼的光辉。”^[9]死亡作为附加在死者身上的一种价值，形成对死者本身的宽容和高扬。死亡本身构成了一种价值尺度，它不容对死者不恭。死者的重要性往往因为死亡而更加突出了，死者只让人眷恋而不会给人带来恶感，

丈夫对亡妻的优点、美好性格加以过滤提升，一定程度上原谅她的缺失不足，于是仿佛她成了最完美的妻子，甚至于她生前的缺点、可气之处，也变得可爱可贵，令人怀恋。如清人陈祖范：“我辈钟情故自长，别于垂老更难忘。不如晨牡兼狮吼，少下今朝泪几行。”（《悼亡》）对丈夫来说，他已经失去了妻子的全部，所以哪怕是曾经拥有的妻子的缺点，也是难得而可贵的。在接受心理中，对悼亡文学有着近乎本能的宽容，人们往往不去计较死者的缺点而夸大其优点美德，甚至虚构饰美，这种接受心理被创作者所了解认同。“从众心理、社会酬酢及文人唱和之风，使得接受主体中的期待视野趋于稳态化，似乎不对死者溢美夸饰，反倒不近人情了。”^{[10] (P333)}

中国古代悼亡诗从人伦角色出发，强调个体死亡对现存人伦关系的破坏、亲人角色的缺失给家庭成员带来的影响。“大陆性农业民族的家国一体的宗法制社会制度，血缘关系派生繁衍的浓郁的伦理精神，是哀祭文学顽强持久生命力的源泉。”^{[10] (P333)}不同于西方社会以个体为本位的文化，古代中国是以家庭为最小、最基本的单元，个体存在于社会上不是独立的，而是生活在特定人伦关系网中的关系存在。因而中国悼亡诗，特别强调妻子死亡给丈夫、孩子带来的情感创痛，强调妻子、母亲人伦关系上的空白。一个人死亡，肉体生命从世上消失，并不意味着他给周围人带来的影响也随之消失，情感纽带的继续存在，使得因他们逝去而空缺的角色，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很难去另找一人替代，至亲的角色关系更具有不可替代性，因为他们已是生者情感世界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在悼亡诗中，形成着眼于妻子应尽的角色责任，通过至亲生者的反应来以生衬死的模式。杨慎的：“伤心孺慕声声切，母在黄泉听得不？”（《八月十三日夜梦亡室安人惊泣而寤因思去年丁》）韦应物的：“幼女复何知，时来庭下戏。”（《出还》）天真可爱的幼儿进入作品，增大了伤悼的情感力度。上述模式中出现的生者总是亡者的至亲，如她的丈夫和孩子，甚至未必非要状写尚存的至亲的多么哀痛，只要稍微提及他们的存在，妻子死亡给一个家庭所带来的沉重打击、给未亡家庭成

员带来的人生悲剧性变故，就昭然若揭了。如纳兰性德：“怕幽泉，还为我神伤。道书生，薄命宜将息，再休耽，怨粉愁香。”（《青衫湿遍·悼亡》）悼亡诗产生了视点转换，不是生者哀悼死者，而是死者怜悯生者，死者本身的离世已算不了什么，可悲的是因其离世而带来的影响——现存人伦关系的破坏。一个个和美家庭幸福安宁的横遭否定，作者的伤痛不仅源于失去妻子，也源于怜悯自己和孩子。

同类尤其是亲友死亡的情感撞击，会引发对死亡这一哲学命题的别样思考、死亡恐惧和存殁之感，伤悼他人进而感伤自身。首先，他人尤其是至亲的死亡会影响到自我价值的部分失落。作为社会动物，基本的人际关系是每一个生命个体情感生活不可或缺的，人们要在其中得到理解、愉悦和对象化的确证满足。由于昔日理解自己的亲友已不在人世，自我的价值就失去了确证的较佳对象。至亲的逝去意味着悼祭者与他紧密相关的一部分自我也随之逝去。其次，亲身经历的身边人的死亡，以鲜明而残酷的方式提醒在世者必死的最终命运，引发对死亡的恐惧和生命忧患意识。人是唯一知道自己必死的生物，哀悼者的悲痛源于对人生必然归宿的一种超前意识，由伤悼他人联想到人类命运，进而归结到感伤自我，也就是所谓的悼人兼自悼。如梅尧臣：“结发为夫妇，于今十七年。相看犹不足，何况是长捐！我鬓已多白，此身宁久全？终当与同穴，未死泪涟涟。”（《悼亡三首（其一）》）写夫妻间的深厚感情。梅尧臣与妻子结婚十七年，不仅没有丝毫的厌倦，反而相看不足，宛若新婚。日日相对犹嫌不足，更何况是生死永诀。他在丧妻后情绪消沉，甚至想到自己已两鬓斑白，必将时日无多，一心想着死后与妻子同穴。诗人由哀悼死者，引发对自身暗淡前景的感知，产生对人生种种有限性的不满又无可奈何的情绪激荡，从而对自我生命存在及其意义进行深刻的体验思考。

悼亡诗突出表现伤痛还因为丧葬文化的推动作用，是丧葬价值观支配下的下意识反应，甚至有时是一种角色的自我表演。尽管众多原始部族都存在悼祭仪式，可像中国古代这样很早就将丧悼文化理

性化、构成文学主题乃至一种文化主题、风俗事项的，却并不多。早在周代，碑碣祭谏就产生了，东汉以来“碑碣云起”，此后历代繁盛不绝。先秦诸子时代，儒家、荀子就从伦理角度强调丧祭，形成以伦理尺度裁定人们丧葬态度的思维方式，葬礼、祭礼等仪式规章成熟，这种习俗反应到中国古人情感系统里，强化了人们对死者的情绪反应以及对生命被摧折的关注痛惜。两汉之交更加伦理化了的儒家文化强化了悼祭的伦理意义，君主的倡扬，精英的参与，使得悼祭文学中最朴挚的感情也常常无法停留在日常情感宣泄的层面，而因文化氛围成为一种特定的文学现象。每一个个体对丧葬伤悼的态度，直接影响到社会、他人对其人格的品评。因为正妻亡故后丈夫赋诗悼亡是一种常制，所以有的人即便对妻子感情不深，为符合礼制也要写几首无病呻吟的悼亡之作。在丧葬至哀的价值观念影响下，哪怕是多年之后撰写的伤悼文字，除了抒发感情外，也有意识地因广受认同的模式进行角色表演。陆游晚年为唐氏作过许多悼亡诗，其中多首以沈园为题材，那曾经同游又曾经诀别的地方，如“梦断香消四十年，沈园柳老不飞绵”（《沈园二首》），一直持续到八十五岁，辞世的最后一年，念念不忘将近六十载。也许其中并非全都是有意为之，多数人尤其是悼祭文学成功的写作者并非矫揉造作，但是这种由丧悼价值观支配下的文化无意识，却在潜意识里影响着每一个哀悼者。

总之，因为死亡意味着逝者的永久性消失，它对人伦关系的破坏，由此引发的死亡恐惧和生命忧虑以及丧葬文化的推动作用，使得中国古代悼亡诗

形成突出表现伤痛的特点。这是真情之作和迎合礼制之作两种类型的共同特点，悼亡诗的写作时间也因此而集中在丧妻之痛最强烈的时候。

中国古代悼亡诗在发展过程中形成了共同的写作传统。悼亡诗有真情与迎合礼制之作两种类型，写作时间集中在丧妻一年之内，其中对哀痛体验的深度书写，有别样的哀伤之美和动人之情，悼亡诗因而具有独特的认识价值和审美价值，在中国古代文学、悼祭文学中成就斐然，独树一帜。

参考文献：

- [1]杨周翰.镜子和七巧板[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
- [2]（唐）元稹.冀勤点校.元稹集[M].北京：中华书局，1982.
- [3]朱光潜.诗论[M].北京：北京出版社，2009.
- [4]（明）顾炎武.华忱之校.顾亭林诗文集[M].北京：中华书局，1983.
- [5][美]库伯勒·罗斯，凯思乐.张美惠译.当绿叶缓缓落下：与生死学大师的最后对话[M].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08.
- [6][苏]伊·谢·科恩.佟景韩译.自我论[M].北京：三联书店，1986.
- [7][美]罗洛·梅.冯川译.爱与意志[M].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7.
- [8][美]赫伯特·马尔库塞.黄勇，薛民译.爱欲与文明[M].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
- [9][德]费尔巴哈.赵璧如译.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上）[M].上海：三联书店，1959.
- [10]王力.永恒的眷恋——悼祭文学主题史研究[M].上海：学林出版社，1999.

The Writing Tradition of Mourning Poems in Ancient China

SHEN Tong

(School of Literature, Nankai University, Tianjin 30071, China)

Abstract: In the history of ancient Chinese literature, mourning poems refer to the poems in memory of the deceased wives and concubines. Mourning poems have developed with the times and gradually formed a common writing tradition. There are two kinds of mourning poems: the genuine mourning poems and the imaginary invalid poems. Such poems were written within a year of his wife's death and on the anniversary of her death. The number of mourning poems has dropped afterwards. Occasional writing occurred only when memory triggered by special

events at specific time and place. Highlighting the pain is the common feature of the two types of mourning poems, and the writing time is therefore focused on the most painful moment of the loss of his wife. There are four main reasons to highlight the grief: the permanent loss of the deceased; the destruction of human relationships; the fear of death and worries about life, and the promotion of a funeral culture.

Key Words: mourning poems; writing tradition; characteristics

作者简介: 沈 童 (1992-), 女, 河北石家庄人, 南开大学文学院 2018 级在读博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 唐宋文学与宗教。

[责任编辑: 张胜广]